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〇期 ——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110c)

---

【史海钩沉】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陈 昭
【当事者言】	“9 1 3”后我怎么成了“林彪死党”	时念堂
【文革一页】	“联动”，红卫兵中醒着的人	李卫雨 • 张爱民 • 纪 彭
【书刊评论】	中共何时重评林彪案？	穆 天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 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三把钥匙

• 陈 昭 •

笔者诵读《邱会作回忆录》，有三句话跳入眼帘，无论如何挥之不去，令笔者冷汗阵阵，毛骨悚然：

第一句话——毛泽东在得知林彪摔死后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第二句话——周恩来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第三句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

笔者读到这每一句话，无不惊出一身冷汗。笔者认为，这三句话极为重要。打开文革史、中共党史的迷宫需要一大串各种各样的钥匙，而这三句话应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三把。

#### 一、第一句话——毛泽东说：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林彪之死，惊天动地，震动全球。人们从来不知道毛泽东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坊间有一些传说，如说毛很悲戚，说毛摔东西，说毛抄诗寄哀思……现在，邱会作将军告诉了我们：毛泽东的态度是两个字：高兴，而且非常高兴。这样的态度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能不让人毛骨悚然。

邱会作说：“从（9月）15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786）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与我们碰了杯。并且说了‘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邱会作回忆录》，页798）汪东兴说，毛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参见《邱会作回忆录》，页788；《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页627）毛不仅自己高兴，还把自己的高兴传达给政治局的委员们，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高兴，让大家和他一起高兴。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死亡的第一反应。

和毛泽东同样高兴的是“四人帮”及其一伙，还有汪东兴，他们“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这种“高兴”，是远离人性的，但是，却符合“毛性”，是典型的“毛性”。面对林彪死亡，高兴的是极少数。

“叶剑英看到他们（指“四人帮”）的这种表演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姚文元红着脸叫：‘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这几句落地有声的话，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页511）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后真实反应》，红军之鹰吧）

黄永胜则扯肝裂肺地吼叫：“他妈的！跑什么跑？！”（《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页563）

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普通民众的反应基本相同，仅举一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中国新闻周刊》，2011—08—19）还有无数的民众在想：天啊！毛主席的脸该往哪儿搁啊！还有一些典型表现，如彭德怀，非常值得回味，本文不赘。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对以上的这些态度简单地加以分析，很容易发现，凡是与毛泽东靠得近的，是高兴，干杯。显然，这离开正常的人性实在太远了。与毛泽东离得远的，态度则大不相同，或大惊，或大骂，或彷徨，或不知所措，这是人之常情。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表现是极其不正常的，需要我们认真解读，反复思考。

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人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毛究竟为什么这么高兴？按照常人的感情，常人的道理，作为毛泽东，胜过自己亲兄弟的“亲密战友”死了，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死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军队的第二号人物死了，而且死得那样突然，那样惨，一家人几乎死光，作为掌门人，作为“一家之主”，能高兴得起来吗？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敌手应当是蒋介石。当毛泽东得知蒋介石死亡的消息时是什么表现呢？——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寓所去世。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出乎大家的意料，毛听

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  
([www.360doc.com/content/07/0611/12/12419\\_551459.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611/12/12419_551459.shtml))

一个是异常高兴，一个是一脸凝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毛泽东就是与众不同，他不但高兴，而且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七十八岁的老翁，为什么会如此反常的兴奋？笔者试着揣测毛泽东高兴的原因有四：

其一，林彪死了，确实确实死了；其二，林彪一家的主要成员一起死了；其三，林彪死在了中国领土以外的地方；其四，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完满地实现了。

首先看一：文革是毛泽东的终生大业，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与毛唱反调，表面上跟着毛画圈圈，骨子里极力反对。特别是林彪纠合军委办事组和军队的将帅们，把军队看得紧紧的。毛泽东认为，军队的“三支两军”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错了，和毛泽东、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对台戏，林彪还居然敢公开向江青叫板。最让毛胆战心惊的是在庐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带到了反对毛、反对文革的路上去。这岂不是要了毛的老命？这样的人，必须尽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时、一分钟都会使毛坐卧不安，使毛贯彻文革路线，和安排继承人的计划根本无法进行。林彪实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说，文革中，毛有时以势压人，混不讲理；有时谎话连篇，瞒天过海；有时栽赃陷害，恶意中伤；有时发狠发飙，不计后果；有时兴之所至，信口雌黄……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无法向民众和历史交代。现在正好有了林彪这个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错事、坏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众的一切怨恨，统统让林彪承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他永远不会说话了，省却了多少麻烦。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谢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泽东能不高兴吗？

再看二：林彪和他的老婆、他的儿子一起死掉了，几乎满门死光，免除了后患，特别是林立果，他死了最好。遗憾的是，林豆豆没有听命令，不和他们一起上飞机。不过，这已经是毛想看到的最好的结局了——毛能不高兴吗？

第三，纵观中共历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毛要打倒一个人，一定要给他戴上“野心家”、“阴谋家”、“反党集团”之类的帽子。但是，制造这些帽子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要罗织罪名，编造理由，每次都漏洞百出，毛只能靠权势压服。毛整人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给政敌戴一顶“叛徒”帽子，只有这顶帽子才最省事，更可以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可是，若是按照“刘少奇式”，需要查档案，找证人，编材料，连懵带骗，劳神费力，还破绽百出。现在，创造了这个崭新的形式——“林彪式”，他死在了中国领土之外这么一个绝妙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叛徒”帽子扣到他头上，还可以加一顶“卖国贼”，什么理由也不需要编了。他要是死在国内，就无论如何戴不上“叛徒”帽子，那就很难打倒他。而且，对林彪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因为他没有任何把柄在毛手里，他清心寡欲，对权力没有丝毫兴趣。特别被动的是，刚刚两年前，是毛泽东提名把他写上了党章，成为了毛的什么“接班人”。不用“叛徒”这个“杀手锏”，把他除掉实在是不可可能的。——毛能不高兴吗？

最后看四（这也是一个推测，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但是却是必须有的推测）：毛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除掉林彪，最大的难处是没有理由，可是又必须把他除掉。毛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最后，请君入瓮。把林彪一家诱出北戴河，诱使他上飞机，然后，让飞行员强行起飞，这时，毛的计谋就成功了一半。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毛还给飞行员下了死命令：必须飞到中国国境以外。周恩来、

汪东兴还向毛请示要不要打掉他，周、汪简直糊涂透顶！为了双保险，毛又很可能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绝对保证飞机只要上天就永远不可能活着下来。现在，毛的计谋完满实现，林彪一家被烧成了灰，抛尸外蒙古的黄沙之上。飞行员也一起命赴黄泉，所有的秘密也都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毛一生奉行的哲学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不过是陪衬，真正使毛“其乐无穷”的，是与人奋斗。这才是毛泽东的哲学的真谛。今天，毛与林彪奋斗，把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对手打得死无葬身之地，毛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怎么能不特别高兴？

有人 would 认为笔者在胡诌，在污蔑“伟大领袖”。笔者说，不是，这是在合理的推测分析。有这种看法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请诸君仔细想想看看，“9 1 3”当夜，“中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哪一条不是唯恐林彪不离开北戴河，唯恐林彪不上飞机，唯恐林彪不跑的！？

李作鹏将军对“九一三”事件最大的质疑就是：“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 2 5 6 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而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页 5 7 6，5 7 7）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李作鹏想清楚了什么？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2 0 1 1 年 9 月诸多网站有此文）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先生认为：“事实上，北戴河距离山海关机场至少还有四十分钟的车程，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杆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当时，吴法宪就曾从旁提醒过周这一点，还建议他让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下令，在跑道上摆汽车，拦阻飞机起飞。周当时虽然答应了，实际上却并没有落实下来。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 0 0 3 年版，页 3 4 8）

王年一和笔者所写《2 5 6 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一文，详细分析了林彪座机坠毁的种种疑点。（载《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 0 0 4 年）现在，从毛泽东的异常高兴的表现，是不是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疑点？

我们需要仔细分析毛的这句话，必须看清几个关节点：感谢、帮忙，而且是帮了一个大忙，不是小忙；是“帮了我”，不是对别人，不是对“我们”，不是对共产党，只是对我毛泽东，只是对我一个人；所以我毛泽东是真心地感谢林彪。

邱会作将军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特别重。发生‘9 1 3’，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9 1 3’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 2 0 1 1 年版，页 6 2 8）

邱会作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也就是对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处理了。从 1 7 日开始什么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轰炸机、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渐出来了。林彪是顽凶，是‘现行反革命’的头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对林彪是先定为武装政变的现行反革命头目才处理的，不先给林彪定下罪名就无法处理，也没有什么可处理的，所以，当时搞清林彪的问题毫无意义；如同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一样，不先在他头上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项反革命性质的帽子，也是无法处理，道理是一样的。先‘杀’后示众，是对刘少奇、林彪处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确实帮了主席一个很大的忙！接着‘二月逆流’，‘贺龙问题’，‘杨余傅问题’，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担当了。”（《邱会作回忆录》，页786—787）

邱会作将军的判断没有错，林彪死后的历史确实如邱会作预料的一幕一幕的上演，剧目比邱会作想象的还要多得多。最后，竟然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身上。

当然，必须看到，毛的高兴没有持续几天，他就一蹶不振了。或许这叫“乐极生悲”。但是，毛给我们留下的这句话和他的异常举动，是需要反反复复咀嚼的。

## 二、第二句话——周恩来的“中央政治”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读到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周恩来对于“中央政治”的概括。邱会作说：“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页680）

在这里，周恩来创造了一个特殊词汇——中央政治，并且对它进行了阐释：所谓“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与毛泽东的关系，与林彪的关系，与江青的关系。注意，这个话，周恩来向黄吴李邱“讲了几次”，可见周恩来十分看重。我想，周是把这些看做自己在“高处不胜寒”之地的心血结晶，看做自己为官的秘诀，因此传授给自己的下属和晚辈黄吴李邱。周也确实依靠这一秘诀，得以在变幻莫测、腥风血雨的中共党内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周对黄吴李邱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讲了一次又一次，一定要他们领会。

邱会作刚刚听到周恩来这句话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发生了‘913’事件，懂也没有用了。”（《邱会作回忆录》，页681）

从邱的上述话语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说的“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1）直到“913”事件以后，经过二三十年的炼狱，邱会作终于渐渐悟出了周恩来的超人智慧和有别于他人的政治眼光。

感谢邱会作将军给我们提供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打开中共党史迷宫的一把重要的钥匙。周恩来是如何处理他与毛泽东、林彪和江青的关系的呢？

### （1）周与毛的关系

周与毛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转折，一是延安整风，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进”。延安整风时，毛为了把周恩来这个昔日上级的威风彻底摧垮，把周当做仅次于王明的第二批判重点，当做“经验主义”的代表，狠狠批判，让周彻底臣服自己。从此以后，周就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一切服从于毛。周恩来原来是毛的上级，通过延安整风，不是降为毛的战友、同事，而是变成了毛的臣属，变成了毛的“后勤部长”。

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毛泽东心血来潮，指鹿为马，狠批周恩来，说什么离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不得不提出辞职。从此，周又进一步蜕变，从一般意义上的“臣属”，蜕变成了毛的奴仆。凡是毛的话，不论对或错，周都言听计从，照办不误。许多时候，周明明知道毛是错误的，但也按照毛的旨意办。发展到文革，周便当然地成为了毛的忠顺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周不但自己甘当毛的忠实奴仆，还要使毛的皇权达到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曹长青：《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载美国《世界周刊》1992年3月15日）周恩来甘愿做毛泽东的工具，在某些时候甚至和江青一样，也做了毛泽东的一条狗。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周恩来自己得了癌症，毛却违背医疗规则，把医生的医案视为废纸，不准给周做手术，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时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浪，把周批得狼狈不堪；毛还攥着“伍豪启事”的杀手锏，随时准备给周以致命一击。——毛对周从肉体上、从精神上、从历史上三箭齐发，简直残忍到了极点。最后，周早于毛九个月离开人世，才结束了毛周关系这一幕惊心动魄的丑剧。

在周与毛的关系上，周给黄吴李邱所做出的示范，就出不了上述的框框：就是要无条件地臣服于毛。在这一点上，黄吴李邱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在他们心中，毛也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头领，他们对毛同样忠心耿耿，说一不二，一直到他们离开人世。黄吴李邱和江青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和毛不是一回事。

### （2）周与林彪的关系

周与林彪的关系只发生了一次转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几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级，自此以后，林变成了周的上级。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好处。林虽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终对周毕恭毕敬，把周视为师长，并且要求黄吴李邱好好服从周的领导，帮助周分担和解决困难。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的回忆录中有许多有关的叙述，读来催人泪下。文革以来，周恩来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严，能够得到亲情和温暖。因此，周恩来深情地对邱会作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83）周与林彪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后，周恩来看清了毛的意图后，完全站到了毛的一边，参与毛对林的最后围剿，致使林彪葬身异国荒沙，至今尸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极点，令人心寒到极点。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讯后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 （3）周与江青的关系

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来，江青与周是不可比的，

因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于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让江青当上了冲锋陷阵的“旗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让江青成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江青就变成了周的“上级”。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骄横、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摆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于周自己性格上的特点，周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变成了江青的下级，甚至臣民，甚至奴仆。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会上，周恩来甚至喊出“江青万岁”的口号。毫无疑问，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级吹捧。

黄永胜对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黄永胜的儿子问黄永胜：‘你对周总理怎么评价？’“‘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他做了一个在墙上抹泥的动作。“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你要帮我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你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着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着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着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一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一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页539—540）

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给黄永胜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们读完这段文字，也是悲愤难平！堂堂中共权力最顶峰的人物、一国总理周恩来已经沦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周恩来凭借着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将一个中央政治局拖着跑，让政治局也变成和他一样的奴婢。被周恩来拖着的还不是个别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的正式会议！这成什么体统！周恩来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变成了对江青“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吴法宪也回忆道：“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我们来到江青的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732—733）还有周恩来为江青试水杯的水温热不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疯狂，如此嚣张，一方面得自于毛泽东的娇宠和纵容，一方面也得自于周恩来的恭顺、驯服和奴性。

如果没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书，善良的人们就是有天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级的领导核心会是这么不成样子！周恩来想要黄吴李邱学着他的样子对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几员武将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为，胡搅蛮

缠，无法无天，而且也不顾起码的礼仪；二是因为他们以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泽东是两回事。然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没有入门，他们盲目迷信毛泽东，盲目听信汪东兴的鬼话，以为江青的行为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所为，所以，他们这样做，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然而，他们错了吗？

何谓政治？不论古代还是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被周恩来浓缩概括为这么一句话，浓缩到处理好与毛、林、江青三个人的关系。周恩来不认为“中央政治”应当是一种完备的制度，一种先进的体制，一种严密的规则，一种人人都要承担的义务和具有的权利，却认为只是几个人的关系。这实是中共的一个大悲剧。

### 三、第三句话——邓小平弃军逃跑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这话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正式会议上说的，是不会错的。邓是中共继毛泽东之后供奉的顶级“伟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呢？

邱会作将军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九大期间的大会开得不多，“主席几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组的召集人、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主席不厌其烦地多次讲话，这么上心，这么用心良苦，是少有的。”（《邱会作回忆录》，页625—626）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毛在会上大谈共产党的“路线斗争”，其中谈到上述对邓的评价。

毛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有正式文件依据，毛把邓曾经“弃军逃跑”定为邓所做的“许多坏事”中的首要一条。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邓没有说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说清楚真相。“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这是“逃跑”。“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

据知情人说这一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

邓小平不仅有这两次见危险就跑的卑鄙行为，据知情人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可见，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

现在，我们读邱会作将军的回忆录，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弃军逃跑”这四个字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联想。

“弃军逃跑”非常浅显明了，小学生也能解释得清楚。逃跑是可耻的，弃军逃跑更是可耻的。如果所弃之军是一个排、一个连，虽然可耻，但罪过还比较轻。然而，当时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个军的政委，以如此高级的职位，在危急关头，竟然抛弃自己的部队逃跑，的确是大大的“坏事”，是大大的罪恶。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犯下这样的罪恶，笔者认为，只能从邓的品质上解释，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难道允许有第二种解释吗？邓小平弃军时的局势，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在这样危在旦夕的时刻，作为主要指挥员，却能够扔掉部队，自己逃走。这样的事，在军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由于邓的这一品质，决定了他的许多行动具有卑鄙齷齪的性质。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来没有当中共中央主席，也没有再当一次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没有当国务院总理，但是，他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扮演了现代“慈禧”。由于邓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实际地位，主宰了中国一段时日，从而使他的品质充分暴露，把他的真实嘴脸展现在国人面前——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视为玩物，把党的章程视为手纸。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1982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样，他得以以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一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从而，一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从此，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诞生了，也被后来的“核心”继承下来，且看明年的十八大会不会“发扬光大”。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一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一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见到权力就拼命抓，抓住权力就死不放手，这和见到危险就逃跑，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小平这样的行为，不从他的品质来认识，成吗？

让我们再看看邓小平为了早一天重新爬上权力最高层的表演。

林彪事件爆发，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邓小平看到他重新出头的机会到了，就费尽心机争取早日东山再起。邓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须讨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欢心，1972年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这个“永不翻案”的保证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邓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证是不够的，必须有特殊的表现。

高文谦先生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所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指1973年11月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邓不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注）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471—472）

邓的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泽东满意，于是，邓就踩着病入膏肓的周恩来的身体爬了上去。至于周恩来怎么样，邓就不管了。为了自己抓到权力而不顾一切，这又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邓这样的行为，不用他的品质来解释，成吗？

邓小平一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一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邓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为了支持灭绝人性的波尔布特野兽政权苟延残喘，悍然对越南发动战争，“教训教训”越南，使中国几百万平民子弟当了炮灰。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一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一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开创了用法律手段解决党内问题、镇压共产党老干部的恶劣先例。对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小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统统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据不是证据，而是根据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

4，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近日，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有能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已经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倾泄7亿立方米洪水。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刹那间变成水底冤魂。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六十亿立方米的洪水，使东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一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一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参见2011年8月25日诸多网站）这一水库垮坝惨剧被评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惨烈的十一项人为惨剧第一名。（其他有核电站爆炸、农药中毒、飞机失事、楼桥垮塌、巨轮沉没等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邓小平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特大灾难中的表现，难道不是他的品质的真实写照吗？

正是由于邓小平自身的恶劣品质，所以，邓在有关党史研究，有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上，三令五申不许涉及个人品质，不许作道德评价，要“宜粗不宜细”。邓曾经说过：“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98）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之所以产生一系列问号和空白，得出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就是因为不考虑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抓住这个关键，许多问题简直像痴人说梦，根本解释不通。

有无数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十分恶劣，十分肮脏。邓小平是个从来没有理论的人，是个不讲理论的人。许多年以来，邓小平被他“御封”的继任人用一些“光环”罩着、护着，所谓“总设计师”、“核心”，还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即使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对他也不能揭露，更不能批判声讨，甚至连回忆都不准。笔者认为，打破对邓小平的吹捧和迷信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是不可绕过的坎。不揭露和批判邓小平的种种谬论、丑行和罪恶，中国不可能前进。

## 结 语

邱会作回忆中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的三句话，非常珍贵，非常重要。虽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话，却可以为我们吹散许多迷雾，扫清许多重大的障碍。中共把中国大地搅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把中国引向了错误的道路。由于中共把自己的历史弄成了一个迷宫，发生了一个错误，就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二个新的错误；然后，又用一个谎言遮盖，于是又犯第三个更大的错误……如此滚雪球，错误越犯越多，谎言越编越大，迷宫也越来越玄，打开迷宫需要的钥匙必然也就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这三句话可以视为许多钥匙中的十分重要的三把，它像显微镜、望远镜，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文革，认清中共的本质。感谢邱会作将军的洞察力，他能够抓住如此重要而关键的内容，为我们指点迷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 【当事者言】

“9 1 3”后我怎么成了“林彪死党”

• 时念堂 •

编者按：时念堂原空军第34师（专机师）师长。

#### ◇ 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那时候还不是苏联教员，而是日本教官。那些日本教员都是关东军战俘，经过我们的教育愿意留下来。当教员时，中国话说得不怎么好，但是都能听得懂。开始，我们非常恨日本鬼子，觉得鬼子没一个好东西。但是经过接触，发现这批日本人也追求进步，战争后期他们大多数都参与了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我们学飞行时飞的是日本教练机——日本战败后剩下的破烂“99高练”。为什么说是破烂呢？我记得日本教员带着我飞一个小转弯，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转弯，造成的离心力很大，对飞机算是一种“考验”，第一回落地之后，中国教员把日本教员狠狠骂了一顿。因为这批教练机都是破破烂烂的飞机凑起来的，飞这种“花样”的动作很容易解体，摔了怎么办？当时中国飞行员数量极少，很金贵啊。

我1950年10月毕业，11月到长春集合。1951年1月，中国空军购买并改装了42架苏联的“伊尔-12”高空运输机。从此我就开始飞“伊尔-12”。购买这批飞机主要是为了支援18军和平解放西藏。我们部队进藏运输比较困难，当时的民族政策是解放军进藏不能花人民币。所有物资如被服、粮食、饼干都靠空中运输，咱们的部队走到哪里，飞机就空投到哪里。

所谓高空运输机，现在看来升限太低了，爬上7000公尺都很困难。康定山口海拔7800米，所以飞康定山口就叫飞越天山，飞机只能从两山之间飞过去。我们开着飞机爬到云上往西一看，两个山口很清楚才敢进去，空投完赶快调头回来。如果天气不好，两个山口不清楚，或者云很低就不敢飞。我们部队出过事故，一架缴获美军的C46运输机，就在云雾中撞山了。

1953年春天，达赖来北京，我是机组人员。不过，达赖本人坐的是空34师师长胡萍开的那架飞机。那时候的运输机只能坐十几个人，随行人员近百人，只能一个机群，4—5架

飞机。我记得飞机里头挺宽敞，都是沙发，比现在当然要简陋一点了，但是在当时是很高级的。那种飞机速度慢，时速只有220公里，还不如现在的高铁快。

#### ◇ 在朝鲜一年半，执行中立国任务

1952年，我从四川调到北京，改装“伊尔-12”，到1953年才完成。我带了一个中队、六架飞机，到丹东待命，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可还没来得及入朝，朝鲜空军出事了，朝鲜一名飞行员驾机叛变投敌，飞到南朝鲜去了。连累我们进行整治检查、清理队伍，后来把六架减到四架，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进了朝鲜没几天，朝鲜又有一架飞机叛变投敌。我们又受影响，四架飞机回来，重新整顿，人员也重新调配，飞行员的政治条件就要求更高了，四架飞机的机长是四个大队长。

我到朝鲜时已经停战了，我们主要执行中立国的任务。当时是五个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尼泊尔、土耳其。北边有五个口岸，南边有五个口岸，我们在朝鲜这边的口岸执行接送中立国人员、撤兵、撤回物资。当时还有一部分志愿军在朝鲜驻守，所以我们还负责运入物资。

1955年5月1日我回到北京，任“独三团”二大队大队长。那时，飞机有不少，但是比较杂。我记得有“安-2”、“安-45”这种小飞机，也有“里-2”这种中型运输机。“里-2”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专机，后来，使用“伊尔-24”当过专机，之后就是“伊尔-18”。这种飞机比较大，安全性也好，后来又增加了直升机。慢慢地一个团的编制就不成了，就改为空34师，下辖三个团（100、101、102团），一个团是三个大队。1960年，我当上独立团的副团长，1963年改为34师时我就是100团团长。专机主要都在100团。所谓“专机师”，其实是没有谁专门命名。因为我们执行的就是专机任务，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专机师”。

#### ◇ 毛泽东请吃狗肉，实际是汪东兴陪我们吃

毛泽东最早坐过“里-2”，我是副机长。后来，有了“伊尔-24”，毛泽东也坐过。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坐飞机了呢？因为飞机总是有危险性，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不坐飞机，改坐专列。1959年开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在专列上，请我和空34师师长胡萍一起吃了一顿狗肉。不过，其实我们没见到主席，是汪东兴作陪，但名义是主席请我们吃的。

林彪没有坐过我的飞机，他坐的“子爵号”是从英国买的，四台发动机，能坐50来人。这种英国飞机，人家早就淘汰了，因为航程短、容纳的人少，从商务角度来讲不赚钱。英国卖给巴基斯坦，咱们觉得这个飞机发动机在后面，噪音比较小，即便航程短，咱们当专机也就够了。

#### ◇ 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恩来穿梭于国内国外，总是坐我开的飞机。我记得1960年四五月份，从苏联进口的第一架大型飞机启用后，赶上周恩来访问印度。周恩来就成为第一个坐中国人自己的专机出国访问的领导人。坐咱自己的飞机，那心情肯定不一样。上了飞机以后，周恩来倒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可那些部长们，上来之后把鞋一脱，往沙发上一坐，得意得很。

周恩来非常亲切，尤其是对我们机组人员。不管多忙，只要是上了飞机，一定会先到机舱

跟大家问候一下。他总是说：“你们好，受累了，谢谢。”然后跟大家握握手。到了目的地降落以后，除非有外国人在下面欢迎，要不然他都先到前舱去跟大家告别一下，“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好休息”，每次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忙，常常在汽车上、飞机上吃饭。如果是在飞机上吃，那就是我负责给他带饭。在我印象里，周恩来最爱吃四喜丸子。

周恩来经常过来和我们攀谈，问我们飞机飞到哪个机场？今天天气怎么样？咱们要飞几个小时？然后他就回到机舱里看文件、批文件。总理太忙，太累，有时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在距离飞机着陆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总理总会在飞机上洗漱一下。

#### ◇ 刘少奇让“空姐”给王光美当临时秘书

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时，也经常坐飞机，他对我们也很亲切。1965年，刘少奇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之前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对我说：“这次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领导人的夫人都有女秘书，王光美同志没有单独的秘书，这样不太好”，刘少奇就和我商量，叫我们服务员就是现在的空姐，给她当临时秘书。刘少奇最后笑着问：“你看这个事情行不行啊？”我说怎么不行，在空中她们照常工作，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就叫她们跟首长去。

那一次飞行是刘少奇第一次飞越雪山，他对我说，“飞到高山的时候告诉我，我要看看”，从巴基斯坦走的时候，飞过喜马拉雅山时，他果然到前舱来看风景。机舱前面视线最好，刘少奇就坐在机务人员的座位上，一点架子都没有。

#### ◇ 朱德喜欢在驾驶舱看风景

朱德特别和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庐山会议后，从庐山回北京，就是我开的飞机。朱德坐飞机有一个习惯，上了飞机他不喜欢在座位上坐着，而是喜欢和飞行员一起在前舱坐着看风景。起飞他不离开，落地时也不离开。我们飞到大别山上空，天气特别好，他就开始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陈毅元帅是个爽快人，跟机组人员也是嘻嘻哈哈，给你起个外号、开个玩笑，常有的事儿。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时候还邀请我们吃饭，饭桌上给我们介绍，“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小女儿。”陈老总爱吃红烧肉，他夫人却不让他吃，有一次当面用筷子一打，把陈毅夹的肉打掉了，陈老总也不在乎，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 ◇ “9·13事件”前后

“9·13事件”前，领导派我到了阿尔巴尼亚，9月9日晚上才回来，10日我按惯例休息一天，9月11日上午开了总结会。因为快要过国庆了，林彪在北戴河休养，随时可能回京，所以我们都做好飞的准备。我回来以后是礼拜六，立刻就送了一个训练计划，任务之前肯定要熟练飞行，这是11日。12日是一个礼拜天，放假了，到了12日的晚上就出事了。吴法宪电话打到我这里，询问“三叉戟为什么到了山海关”，我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个情况。吴法宪说“你当师长怎么什么也不知道”，还批评了我一顿，我硬着头皮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我不会跟司令员说假话”。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胡萍的电话询问，胡萍说：“你告诉吴司令，飞机正常训练”，我就信以为真了。十几分钟后，我接到通知叫我赶快去指挥塔，我急急忙忙赶过去，一进去，吴法宪又把我批评一顿。“飞机走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我个人也有一些错误。那天传达命令，“两点半以后禁航”。得到命令后，我就要去传达，

一出门就碰到胡萍，胡萍是老师长，又是空军副参谋长，我就先给他报告。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特别的难看，一点表情都没有。随后，我拿起电话给作战科下命令，并告诉他们向沙河机场那边传达，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不准起飞”，作战科问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呢？我说我亲自传达。我本人就在西郊机场，我一说不就传达了嘛？可是南苑机场那边我一忙乎给忘了，结果有一架直升机跑了。这是我的责任。

◇ 被关了11年，生活待遇还不错

“9·13事件”后经过40来天的审查，专案组的人就把我弄到空军招待所学习班，实际上就是把我给关起来了。我一遍一遍地交代那些问题。专案组的人说我是背下来的口供，我反驳说，这不是背下来的，而是说了很多遍，当时发生的事情还能忘吗？从那以后就一直关着。不过，我还是干部待遇，住在疗养院，条件也都挺好。一人一间房，木地板、一个三屉桌、一把椅子、一张钢丝床，门口24小时都有站岗的，就这样待了七年。

1978年，我被弄到山西劳改农场，公安部一个处长宣布我是“林彪死党”，我说我怎么成了林彪死党的？我要申诉，他说申诉是你的权利。可是哪有说理的地方啊！虽是关着，但待遇还不错：三菜一汤，一个肉菜、两个素菜、一个汤、米饭、花卷、馒头。到了山西就更好了，专门有一个厨师给我做饭。那些管教干部没有把我当犯人。我现在想，关起来也可能坏事变好事，等于把你保护起来了，人家也没有逼供，也没有虐待你，生活上还比较优待。

直到1982年我才回来，在家里待了三年，组织上给了一个结论“犯了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我1943年当兵，一天没有离开过部队，结果给我算退休，连离休都不算，还从正师降到正团。直到今天这个结论也不了了之。现在，我很坦然。脚正不怕鞋歪，咱没有做亏心事。

□ 口述：时念堂，整理：程诉《文史参考》2011年9月1日第17期

~~~~~

【文革一页】

“联动”，红卫兵中醒着的人

• 李卫雨 • 张爱民 • 纪 彭 •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名词被人们所熟知。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学生贴的大字报就纷纷署上红卫兵。

“联动”全称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是“红色贵族”。“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等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了许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他们是最早得势的红卫兵，也是最早觉悟的红卫兵，还是最早完蛋的红卫兵。

这些干部子弟比起那些老百姓家的孩子还是要多点政治头脑。当“文化大革命”斗争不断升级，他们不久就看出“文革”是要打垮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打倒自己的父母，闹了半天自己点起的这把火是为了烧自己的父母啊！他们发现再斗下去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只能组织起来自救，由于长期自命为“无产阶级接班人”他们用“血统论”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联动”的行为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被定为“反革命组

织”，1967年，他们遭到中央文革的无情打击，整个组织被解散。

◇ 李卫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都是军队干部子弟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老红卫兵代表。上将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当年在首都师院附中念高一，她告诉记者，老红卫兵开始是很狂热的，心里只有毛主席。直到今天我要是听到谁说共产党不好就好像说我似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师院附中（现在的首师大附中）高二的学生，那时16岁。“文革”开始后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一下就起来了。当时，我们的红卫兵组织人员相对比较整齐，学校在海淀这边，挨着军队大院，铁道兵、装甲兵、炮兵、总后、通讯兵、海军、空军都在一起，都离师院附中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的整体素质就比较高，教学质量也比较好。有这样的基础，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就发展特别快，干部子弟比例比较高，组织化很强。

运动开始不久，红卫兵就控制学校，随即成立了保卫队，有什么紧急的情况、紧急的任务时，一说保卫队集合就能哗啦一下都动员起来。保卫队的成员以军队的干部子弟为主，这些孩子家里都是部队的，纪律性强，着装也比较整齐，一水儿的从家里拿的旧军装。

◇ “八一八”，毛主席的接见是老红卫兵势力的顶峰

记得是8月17日晚上，学校通知我们第二天要开大会，当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活动，只是说叫保卫队去执行任务。学校派的大卡车就把我们拉到了中山公园，晚上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住下，当时的中山音乐堂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封闭的，是开放的，有顶棚但是没有墙壁，晚上我们就睡在舞台的木板地上，把原来的地毯卷起来当枕头，完全没有铺的盖的就那么睡了一夜。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冥冥中就觉得明天肯定有激动人心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人通知说，一会儿可以上天安门城楼上面，还有中央领导接见。大家激动地欢舞起来，我高兴得不得了。当时，我就是个普通的红卫兵，职务是我们班的红卫兵组长，也不是什么领导，懵懵懂懂地听着叫我们集合，糊里糊涂地跟着大部队从西侧楼梯上了城楼。

一上城楼就发现我们师院附中和其他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同学都混在了一起，各个学校的红卫兵都乱成一锅粥了，乱哄哄的没人维持秩序，海淀区好多学校的同学都互相认识，大家交叉到一起就说开了，叽叽喳喳的没完，每一个人都激动得不行，都有说不完的话。这时候说是中央领导要来了，叫大家整好队伍，可是这乱局谁也收拾不好。就在这时候周总理过来了，他亲自给我们整队，总理也没个话筒，就那么大声的喊，“同学们，按学校排好队”，一遍一遍地喊。大家看总理在那里亲自指挥，也就都赶紧归队，心里都想着别叫总理累着了。观礼台上各个学校逐渐形成了方阵，围着观礼台的空间一圈，开始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一会儿，我们远远地看见一群人，从天安门城楼那边走过来，走在前面的是毛主席，后面是林彪、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

毛主席一过来就往我们这边拐，第一个就接见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大家兴奋极了，一下就沸腾了。其实，毛主席往我们这边走的时候，我就在第一排，可是主席越接近我们，我心里就越紧张，人家都是使劲往前凑，我却是有意识往后让，我本想给主席让出地方，可旁边的人哗地往前拥。我旁边就是上将苏振华的女儿苏燕燕，她就比较胆大，一步就跨上来，挤到前面挽着主席的胳膊，拉着主席的手，所以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就是她紧挨着毛主席，我就在她



后侧的旁边。周总理、林彪都插到我们的队伍中间，记者一阵照相，我们就一阵欢呼。照完相之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去一个一个接见后面的红卫兵队伍，握手都握不过来了，改成招手，后来的秩序就越来越差，观礼台上又是一片乱哄哄的景象。我们是头一个被接见的学校，队伍比较整，服装也整齐，最后各大媒体都用的是我们的这张照片，《人民日报》也用的是毛主席和我们的合影。到中午左右就有大卡车把我们接回去了，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我们师院附中的同学，军队干部子弟比较多，从小受的就是正面教育、爱革命、爱党，对于毛主席更是无限崇拜。“八一八”这次接见红卫兵，实际上就是老红卫兵势力的高潮。虽说这时候老红卫兵是最辉煌的时候，可是实际上还是一个被利用的角色。小时候“五一”、“十一”的时候也跟着父亲上过天安门，但是总觉得是沾了父母的光，这一回是凭自己上去的，我自己成了一个能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了，心里就特激动。现在回想毛主席为什么8次接见红卫兵？他就是叫这些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的火传遍各地，要不然地方上怎么发动“文革”啊！

1966年10月之后，父亲被打倒了。我自己脑子就懵了，父亲这么热爱党和毛主席，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成了被专政对象了？在此之后我们学校里的“四三派”、“四四派”就得了势，开始反攻我们老红卫兵，攻击我们，还打我们。当时父母都被隔离审查，学校也不上课，军训也结束了，我自己在家待着才开始思索。

#### ◇ 我们参与抄家也遭遇被抄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好多事情都是中央的安排，比如组织我们去抄家就是上面的安排。我就参与了一次抄家，那个地址是派出所提供的，来去都有卡车接送。没有组织安排，我们一群学生怎么知道谁家反革命？谁家走资派？谁是“地富反坏右”？所以都是有人指示我们。

记得是8月或9月的一天，上面说安排我们学校去这几家抄家，然后大卡车就来了，保卫队集合，抄家去！我们就一窝蜂上车去了。我糊里糊涂地被拉到一个地方就开始抄家。那一家人原先是国民党军官。现在就记得去的是一个黑乎乎的小胡同，好像是南城，有人指示我们就是这家！我们就冲进去了。

我和几个同学到了一个房间发现了一个老相册，就开始翻看相册，看到相册里照片都是旧社会的，有国民党的军官照，还有穿长袍马褂的照片，一看这家人当初就是有钱人，照片很精美，我们几个特新鲜，都看出了神。在照片里这家人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个解放军，好像是南京一个空军部队，我们就义愤填膺，说这样的反动家庭还能当兵？这不是危险么？

我们去抄家的时候，家里只有老太太在，我们一组几个人就一直在看这些旧照片，从前没见过这些东西，赶紧看看新鲜，所以就看了好长时间。看着看着就有人叫我们走，所以也没有去抄什么东西。当然有的同学在抄，后来我还看见几个初中同学打了那个老太太。有人抄到了一些珠宝首饰什么的。走的时候，又有大卡车把我们接走。1983年前后，落实政策的时候要我协同调查“文革”的事情，在派出所我见到了那家人的二儿子。他告诉我，在我们走后，他母亲吃安眠药自杀了。

不过，我抄别人家，也免不了自己被抄家。1966年的国庆节父亲还上了天安门城楼，可刚过完国庆节就倒霉了，这时候总后的造反派就老来家里，把父亲拉去批斗。当时家里的公务员、秘书、司机、厨师都走了，只剩下父母、弟弟和我四个人在家，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经常是突然总后的造反派就来砸门，不赶紧开门，他们真能把门砸坏了。我弟弟那时上小学6年级，他就从楼上一级几个台阶地往下跳，给他们开门。门一开呼噜一堆人就冲进来，“李聚奎呢！跟我们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一阵喧嚣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直到今天我都害怕听砸门

的声音。

◇ 张爱民：我们抄了梁启超弟弟梁启勋的家

当年在石油附中念高二的张爱民对记者说，我们那会儿抄家抄的是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家。他家就在6中的隔壁。6中的同学先抄过了叫我们再去抄。我们得了信息之后，学校十几个红卫兵骑车就去了。梁启勋家是一整座四合院，那家人可真是有钱人家，满屋子都是紫檀的家具。我们还讲政策，不打人，但是把东西抄了。当时公债券，就是国家债券，抄出来好多，一摞一摞地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被我们一把火都烧了。现在想想国家占大便宜了。他们家人都在院子里看着，一把火把人家的积蓄都烧了。还抄出来进口的金表一盒一盒的；现金，10元大钞（当时最大的面额）一摞一摞的；字画古董多得是。我们打电话给派出所，叫他们派车来，一共装了5大卡车。记得我们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东西拉到雍和宫，当时雍和宫是一个抄家物品的集散地，现金一堆堆的，没人清点，金表2盒子数都不数，古玩字画、玉石、竹筒好多，就放在那儿了。就在那几天里，我们骑车出去玩，玩了一天饿得够呛，就拿了一张10元大钞，买了点油饼、烧饼、还有香肠，一共没花10元，吃了一顿，算是贪污了。

“文革”时期，周恩来不是说“我们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现在想内债怎么没有啊？这不是就烧没了嘛！我觉得这种抄家的运动对那些旧时代的有权有势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大打击，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服共产党。

◇ 父母被打倒，激发了“联动”的思考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指使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为首的大学造反派组织，借用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在压制最早成立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同时，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胡乱揪斗主要领导干部，有恃无恐地炮打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对于“文革”运动方向的重大转变，不仅大部分党员干部不理解，广大青年学生也不理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中，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十分惊愕，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怎么突然变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主要领导干部怎么一夜间就被打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们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运动出现的新情况。

1966年11月5日，外出串联回京的北大附中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牛皖平等学生，联系自己所看到的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一一被揪斗和打倒的情况，开始怀疑这么搞运动是有问题的，并开始内部讨论和各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串联。

参与其中的张爱民对记者说，当时我们就是十几岁的中学生，思想上很天真幼稚，但又是很有思考很有水平的。开始我们在党的号召下一下子闹起来了，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随着到各地串联，逐渐认识到了一些问题，这时候文革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从上到下的各级党政领导了，这些领导都被打倒了，其中不少都是老红卫兵的父母。我才忽然发现，老革命都成了反革命，好多叔叔阿姨都被打倒了，后来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倒了。那简直是不理解，老红卫兵的父母都是兢兢业业一辈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好多疑问就开始在脑子里转，对中央文革开始不满。我们当时已经是对中央文革很有意见了，“联动”主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的。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楼二层召开海淀区一些学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的商议会。参加这次商议会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矿院附中、农大附中、北航附中、地质附中、钢院附中、北医附中、101中学、八一学校、育英学校、十一

学校等十多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和骨干20多人，商议会议由北大附中《红旗》负责人牛晓平主持。大家共同商议今后的对策，最后委托北大附中《红旗》的宫小吉起草一个“联动”宣言，确定“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2月5日正式成立，打出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对随意揪斗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旗帜，申明对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聂元梓之流造反派组织进行抵制。

#### ◇ 毛泽东生日那天我们开大会

1966年12月16日，四四派的“首都兵团”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出席。会上的发言重点是批判“鬼见愁”，批评“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江青公开发难，大骂“西纠”是“保守组织”，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必须坚决取缔，大骂干部子弟“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这时，牛晓平与参加“联动”的各校老红卫兵负责人共同研究对策，决定召开一个大会，通过对运动初期红卫兵学生所犯错误进行检查，向社会表示要继续“革命”，同时试探中央文革对“联动”的态度。经过商讨，决定选择毛主席生日的12月26日，在展览馆剧场召开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破私立公誓师大会”。

“破私立公大会”就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问题的纠偏会，检讨我们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干了哪些过火的行为。在“文革”刚开始后几个月就看出自己的问题，看出自己过火的错误，开始要纠偏。当时，中央文革也表示支持我们这次“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江青也已经答应要来参加大会。

1966年12月26日下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联动”大会，主要是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学生参加，也有少数城里中学的老红卫兵学生参加。大会会场主席台上方的会标写着“首都中学红卫兵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两侧悬挂着红卫兵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等内容的红色条幅。会场坐得满满的，过道和后面挤站着不少学生，大约有三千多人。大会开始前，与“联动”联系的所谓《红旗》杂志社“记者”在会场后台通过电话与中央文革联系后，向会议主持人表示中央文革将派人参加会议，他讲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到百万庄建工部北侧的进出口大楼，准备会见红卫兵，要求大会组织者维持好秩序，保证领导的安全。

#### ◇ “联动”喊出：“中央文革中某些人不要太狂！”

张爱民回忆，大会开始后，后台的石油附中红卫兵负责人马晓军与石油学院的樊冀豫等议论，感到这样开会太压抑，几次表示想“冲场”，借大会冷场时机贺邯生、樊冀豫和我三个人突然冲到台上，齐声宣读一份署名“红后代”的传单。

这些同学大声喊出“坚决拥护12月13日军委四位老师的讲话！坚决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反对三司一小撮造反派搞打、砸、抢、抄、抓！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革命的革干、革军子女不是好惹的！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十来条口号，每喊一条口号时，全场都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掌声。当时，我们起草这个传单的时候，本来说点江青的名字，直接说“江青你不要太狂了！”后来考虑到不要太激烈，就没直接说她的名字。对江青一伙指责最严厉的是：“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发泄出老红卫兵对他们鼓惑造反派学生到处乱揪各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宣读完口号后，会场下有人喊没有听清楚，要求再念一遍。于是，马晓军等人又到前台宣读一遍，会场气氛更加热烈，以至站在二楼廊道上的一个学生竟然激动地掉下来。当时，师院附中搞保卫的也没有管住，还有人带着炮竹进来，一个二踢脚把毛主席像还蹦了一个洞。有人喊“别放炮啦！”可也管不住了。其实那天原本江青是要来的，她本来觉得“破私立公”是好事情啊，可是我们反对江青的口号喊出来了，她走到门口就有联络员向她报告，她一看这架势扭头就走，回了钓鱼台。

当天我们印刷了一大摞传单，这些传单一下子就被抢光了。这个传单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后来谁拿了这张传单，上面追查的厉害极了。如果是拿了的，马上就要逮捕起来。后来樊冀豫回忆说，没有一个人揭发是我起草的，询问的人都说，我们不知道是谁发的，是我们捡的。大家没有一个人叛变。

张爱民说自己参与了刻板印刷，后来也没事。当时，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很多已经倒霉了，没有倒霉的也感觉出不对了，社会上的人也指责我们打砸抢，出了人命，我们自己的情绪很压抑，才有了这个“破私立公大会”。当时就希望我们改正那些过火的东西，继续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可是中央文革才不会允许我们这些小孩子反对他们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一方面开始觉悟，开始反对他们，所以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一下子就把我们打压下去。

#### ◇ 谢富治发出“镇压令”

在1966年12月期间，除了“联动”对中央文革发出责难外，北京和外地都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被造反派指责为“十二月黑风”。“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北京林学院就贴出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的大字报；同时，上海市一些学生组织和群众贴出揭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历史问题的大字报。林彪、江青一伙对反对他们的学生既震惊又恼火，陈伯达在1967年1月21日对造反派学生讲话中无奈地表示：“现在有很多人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转向中央文革小组，转向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转向关锋、王力、戚本禹同志。”

1月22日，江青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煽动说：“‘联动’的问题，你们清楚。‘联动’天天在作战，要绞死蒯大富。那些想绞死你的人，也想绞死我。”其用心就是为镇压“联动”制造舆论。

为了镇压“联动”，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造反派开会，指使清华、北航等造反派组织对“联动”全面“围剿”，按照所列名单，发起“斩首”行动，造反派和公安干警联合起来疯狂地围捕，抓了一大批“联动”骨干。

#### ◇ “联动”老巢八一学校最后失陷

据八一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王晓明回忆道：1967年1月25日一早，传来清华附中被抄的消息。我和李旦生等同学骑车前去了解情况。清华附中校园内到处是打碎的玻璃、乱飞的碎纸和汹汹的人声。宿舍楼被造反派团团包围着。不一会儿，曾风云一时的卜大华被推出来，塞进一辆吉普车押走了。返回学校的路上，我们的心情都沉甸甸的，大家都有一种预感：八一学校被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回校后，我们关闭了学校的几个大门，分配值班人员，并在驻地安装了电铃，以备报警之

用。然后我们又到中学楼，搬了些桌椅把楼道堵塞，作为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下午5点多钟，我们站在中学楼的屋顶平台上向西眺望，突然发现远处有一队人沿着田埂走来。近了，才发现他们都戴着红袖章，看不清上面的字样，总之是造反派。他们沿着学校围墙外排成一字长蛇阵，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着。我们马上意识到学校被包围了！我们再看苏州街方向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卡车车队，车上的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钢钎棍棒，一副武斗的架势。还有口号隐隐传来，似是“打倒刘邓、砸烂联动”之类。我们意识到力量相差太悬殊了，为了保全学校，我们决定采取“不抵抗主义”。

包围学校的造反派一直没有动作，只是围而不攻（可能是顾虑“电网”或“军事专家暗中指挥”吧）。直到后半夜，他们才开始三三两两地翻墙进校。当时整个学校一片黑暗，地形又复杂，造反派们都是战战兢兢地向前摸。有调皮的学生在黑暗中突然喊一声：“联动”来了，那些黑影便齐刷刷地扑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造反派们也常常莫名其妙地遭到一顿砖瓦的袭击。后来造反派找到了学校电门总闸，高音喇叭便开始反复广播要同学们迅速自首的通令。

直至天亮时分，一个造反派指着房顶呼叫：“联动”在房上！“联动”在房上！就这样在校的同学被造反派发现了，一个一个被押送到学校教务处后面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被关在一间幼稚园的洗漱室里，又冻又饿，一些同学便坐在水泥地上睡着了。院外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巡逻，上厕所也有士兵持枪监送，气氛相当恐怖。下午4时，院内出现了几十个造反派，学生们被摆布成一个半圆形。然后警员进屋来，一次提出十人左右，站在那“半圆形”的缺口处，依次报自己的姓名。报一个，警员厉声问：是不是“联动”？造反派们便齐声高喊：“打倒刘邓，砸烂联动！联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随后上来两个警员，对认为是“联动”的同学，一人扭住一条胳膊，推到停在不远处的卡车后面，用脚一踢，手一操，就被扔上了车。遇到这种场合，我们一个个都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听说有的同学被吓得尿了裤子。然而也有胆大的，夏家海同学就是一个。他没容警员发问，就自己大声喊道：“我是‘联动’！”警员要扭他，他甩着胳膊，大步流星朝卡车走，还说：我自己会走，用不着推。

抄八一学校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以抄砸八一学校为名，行打击老一辈革命家之实。当时正是所谓“一月夺权风暴”，八一学校被抄砸，可以说是给那些“老家伙”们一点点颜色！

#### ◇ 我们被关进了“红卫兵”监狱

1967年1月，中央文革指使造反派以群众“扭送”方式，陆续将一批“联动”学生关到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刚开始镇压“联动”时，所抓的“联动”成员一个人关在一间房内，后来人抓的多了，就3、4个学生关在一间屋内。被关进监狱的“联动”学生，遭受两方面问题的“审讯”。一个是抓反对中央文革的政治问题，一个是抓打砸抢的刑事问题。在追查反对中央文革的活动时，除了让他们交代反对中央文革的“罪状”外，多次“提审”的内容却始终一样，让他们交代“后台”。

由政法学院造反派接管监狱的“审讯员”们不厌其烦地诱供说：“有人已经揭发了，‘联动’的后台是刘、邓，你怎么还不交代？”“贺龙就是你们的后台，交代他是如何指挥你们的！”有的“审讯员”还威胁道：“不交代后台就影响你的父母！”被关押的“联动”成员识破他们的伎俩，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没有后台，后台就是自己！”反复提审后得不到中央文革想要的材料，“审讯员”们又发出恐吓：“你们要做好被群众批斗的准备。”“联动”成员表示：不怕与造反派辩论，还想经风雨，见世面。

“联动”成员在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后，对政治产生了厌倦情绪。一个老红卫兵说：“我再

也不过问政治了。”另一个老红卫兵焚烧了“联动”袖章和以前保存的全部传单、日记，含泪同昨天告别：“让我去醉死梦生吧，太阳出来了我要睡觉。”他们情绪消沉，不再与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他们组织地下沙龙，读“黄书”（被封禁的中外小说，以前苏联小说居多），练小提琴，传唱外国歌曲，聚餐，游山玩水……他们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等待着东山再起的一天。果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些曾经的“联动”分子，在蛰伏十年之后，再次华丽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当中有许多今天的风云人物。

当红卫兵运动像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后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

□ 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2期

~~~~~  
【书刊评论】

中共何时重评林彪案？

• 穆 天 •

友人转来香港新出版的一部书——《找寻真实的林彪》。这个题目之所以吸引了我的目光，正是这些年来国内对有关林彪的信息、研究的封锁，使林彪其人特别是“九一三事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今年正逢中共建党90周年，而林彪这位曾经为中共打天下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元帅不闻不问。笔者曾走访过国内多家大型书店，有关中共的所有早期的重要领导人都有传记、回忆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相关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不知凡几。但是关于林彪的著述几近于无。早些年还曾看到过个别关于林彪的书籍，惟现在则彻底绝迹。如此而言，香港出版的这部书就特别具有指标性的作用。

这部书与其他香港出版的关于林彪的书的最大不同点是，根据最新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以及《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对林彪其人其事作了新的诠释，这是以往有关林彪的著述中所没有的。举例来说，林彪自1959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以往官方给予人们的认识是，林彪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投毛所好，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毛泽东神话，为日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林彪毫无积极的贡献。读了这本《找寻真实的林彪》，我们才知道，原来林彪就国家的军事战略和国防工业建设作了很多重要的、建设性的工作，如“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的确立，国防工程的建设，全国基地网的建设等等。林彪甚至深入连队，与连队的指战员们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如何促进和改进连队的编制和装备。另一件让笔者深感惊讶的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时期，林彪主动地将彭德怀任期余留下来得70亿元军费移交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帮助国家尽快地渡过困难时期。仅此一点，让笔者对林彪刮目相看。

这部书另一个特色是，尽可能地还原林彪文革当中的真实面貌。文革当中涉及到林彪的重要事件就有罗瑞卿事件、贺龙倒台事件、杨余傅事件、1970年的庐山会议事件，以及“九一三事件”等。《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对此都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罗瑞卿事件，过去官方的宣传品皆说那是林彪陷害罗瑞卿所致。而此书则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政坛整体形势，指出罗瑞卿事件不仅涉及到林彪与罗瑞卿在工作中矛盾和分歧，更大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对军队的担心，把罗瑞卿视为军队中刘少奇一派的代理人，在发动文革这一大前提下，必须在军队中换下罗瑞卿。而罗瑞卿与其他军中的老帅们的尖锐矛盾也是一个导致他下台的重要因素。这些老帅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叶剑英、聂荣臻等人，这恰恰是现在官方所隐匿不提的。

将罗瑞卿事件归结到林彪身上显然是将这个事件简单化，而忽视了其中更多的内在因素。此外，所谓林彪“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等罪名应该也是中共强加的，缺乏事实依据，书中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辨析。

此书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很多重要的章节都有画龙点睛的较为深刻的评论。如1966年毛林蜜月的总结、1970年庐山会议对中共日后走向的分析、“九一三事件”的总结、1980年“两案审判”的评论等等，这些都是过去其他有关林彪的著述所匮乏的。

至于此书的不足，笔者感到作者对林彪文革中助纣为虐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批判尚嫌不够。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对林彪突出政治、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深为反感。不少人认为，没有林彪的支持，毛泽东也许无法发动文革。作者虽然在“毛林蜜月关系的总结”这一小节中对此问题作了论述，但是还应更进一步探讨林彪当时为何要这么做，是出于主动还是出于自保，亦或是野心的爆发。另外，一些资料的引用似应再作些积极的求证，据笔者所知，有些资料在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作者在引用时应尽可能兼顾其他史料，在众多繁复、变异的内容中寻求更合理、可信的真相。

总而言之，此书是对林彪建国以来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瑕不掩瑜。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林彪这位为中共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军人，依然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这是中共的悲哀。在中国大陆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但是通过民间学者的努力，文革研究和林彪研究还会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这又是世人们为之心喜的。

□ 原载《前哨》2011年10月号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